

“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

陈 峰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和主干传入中国,被解读为经济史观。时人心目中的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1920年代辩证唯物论开始风行,唯物史观退居派生地位。1930年代唯物史观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具体落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1938年“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出现了“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的呼声,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最终将唯物史观导向阶级斗争学说。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经济史观 辩证唯物论 阶级斗争学说 瞿秋白 李大钊

作者简介 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近代中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史观,但多数昙花一现,未能在思想、学术及政治领域产生持续影响,唯有唯物史观经久不衰,至今仍保持巨大的活力。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命运,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和运用亦呈现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

早在19世纪末年,马克思主义已见诸中国人编译的书籍中,开始进入国人的视听,但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普遍关注,真正形成气候,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唯物史观居于关键地位。正如后世论者所观察到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是唯物史观。”^①革命先驱李大钊将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中唯物史观是基础,“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②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而不是空想,“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

* 本文得到山东大学齐鲁(仲英)青年学者项目(2015WLJH09)的资助。

① 陶德麟、何萍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①

此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多偏于经济史观。在李大钊看来,“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② 陈独秀认识到“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③ 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浅说》中指出,唯物史观“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使以革命的色彩者”,其关键在于历史发展变化是由于“生产上之变化,而历史时期的划分是根据生产手段(器具机械)而来的,生产的各种形态产生出不同的阶级”。^④ 1921年,施存统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特色,即在于注重物质的条件。^⑤ 经济组织(生产及分配方法)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一切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精神文化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部构造”。^⑥ 李大钊甚至认为,唯物史观改称经济史观更为妥当。

唯物史观的最初流布与进化论缠结在一起。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是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的。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为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进化论成为走向唯物史观的通道,人们往往是在进化论的视域内把握唯物史观。李大钊对“阶级竞争说”的解读即带有进化论的痕迹;陈独秀则认同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之论。德里克指出,时人理解的唯物史观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进化论的一种形式”,“建基于经济变革之上的进化论的一种理论变体”,它所规定的是经济维度的社会进化。^⑦ 由于唯物史观比一般进化论更严密、更系统、更有说服力,五四以后便顺理成章地逐渐取代一般进化论。^⑧

此时国人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多是转借于日本学者,主要思想资源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当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1919—1930年其作品被译为中文的有20种之多。^⑨ 中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几乎都是以河上肇的作品为蓝本。据考证,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当篇幅引自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⑩ 河上肇提出所谓的唯物史观公式,将唯物史观解说为经济史观,这些观点在中国学者的论述中随处可见其踪迹。河上肇的这种经济一元论又来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1902年塞利格曼在美国出版《经济史观》一书。塞氏主张以经济史观取代唯物史观,因为自然、气候、生物等皆为物质因素,唯物史观所指过宽,不如经济史观直接明确。1905年河上肇将此书译为日文出版(译名为《历史的经济说明——新史观》)。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陈石孚翻译的中文版,成为中国第一部介绍唯

①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第6页。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11月),《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0、27页。

③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答适之》,张君勱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0页。

④ 杨匏安《马克思主义浅说》,《青年周刊》第4号,1922年3月22日,第3页。

⑤ 光亮(施存统):《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觉悟》,1921年9月23日,第4张第1页。

⑥ 光亮(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觉悟》,1921年9月8日,第4张第1页。

⑦ 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贻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4、27页。

⑧ 参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⑨ 赵利栋《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恩格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⑩ 彭明《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钊同志百年诞辰答客问》,《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13页。

物史观的专书。此书对李大钊等接受唯物史观产生了导引作用。

五四时期,在人们的心目中,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陈独秀说:“‘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①自称“极端马克思派”的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有“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一语。有人更将唯物史观称为“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②李大钊指明历史观与人生观的关联:“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乐天迈进的人生观”。^③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传统价值,使人生观问题凸显。^④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加入到19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陈独秀认为,只有唯物史观才能说明人生观问题;张君勱等认为,起于直觉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都可由客观的因果得到解释。瞿秋白认为胡适与张君勱之间的科学与人生观辩论不得要领,关键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时代的人生观随着经济动象而变”。^⑤“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占据上风,确立了科学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角色,社会科学成为人生观的指南。而唯物史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它被时人视为最新科学之代表。唯物史观不是一般的科学,而是科学之根本、科学之母。连胡适都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⑥唯物史观俨然成为当时的一种“超级科学”。大多数人对唯物史观的信从,很大程度源于其科学性,而不是其蕴含的阶级立场、党派属性。

唯物史观不但可以影响社会观、社会哲学,它本身也被认作一种社会学。李大钊一再强调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⑦,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⑧。“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⑨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特采唯物史观为根据,编著此书”,“为完成社会学真正之使命……而主张历史的唯物论”。李达阐论的“社会学”,实质就是唯物史观。这种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社会学的认识可能源自1921年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更早可追溯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学”的论断。1924年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有所增益,其内容不是单纯的唯物史观,而是引入了“互辩律”即辩证唯物论。

此时,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尚未完全连为一体,更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李大钊坦承,马

① 陈独秀《答适之》,张君勱等《科学与人生观》,第29页。

② 李荫清《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第22页。

③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20页。

④ 参见王汎森《后五四的思想变化:以人生观问题为例》,许纪霖选编《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16页。

⑤ 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⑥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1919年8月31日,第1版。

⑦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16页。

⑧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11月),《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1页。

⑨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43页。

马克思将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变化以内,“但虽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①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只“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而“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②他显然是试图用互助论补充阶级竞争说。陈独秀则认为阶级的产生、斗争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说可以互相证明,“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③离开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就会成为呆板的“自然进化说”。^④李汉俊则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公式表明生产力与社会组织的变化之间有人类意志为媒介,“这人类意志底表现在一切过去就是阶级斗争”。离开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沦为机械论。^⑤在此时人们的认知中,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虽有密切联系,但阶级斗争远非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更无法等同于唯物史观。

可贵的是,早期引进传播唯物史观最有力的李大钊并未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绝对完美的学说,而认为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能直接拿来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原封不动地应用于中国社会。他发现“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克思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于是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⑥可见,此时的唯物史观表现出与其他理论学说较强的兼容性、互补性,尚未出现日后那种强烈的排他性。

二

20世纪20年代随着瞿秋白等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国内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重心发生了转移,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此前不同了。受苏联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从人类本体论变为宇宙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作为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居于基础性地位,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退居派生地位。辩证唯物论的引入,虽使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下落,但使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认知更加全面、准确。以往唯物史观被理解为经济史观,注重从经济角度把握历史变迁,引入唯物辩证法之后,政治、文化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受到重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唯物史观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用语越来越流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说“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不能轻谈国故。^⑦不过,郭沫若等大多数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实际应用的仍然是唯物史观,主要从经济层面解说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变动。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唯物史观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书写模式,既不同于以王朝更迭及政治变迁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又区别于晚清以降进化史观主导的文明史。社会史论战参加者将社会经济活动作为历史运动的主轴,着眼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联互动,对中国历史进行贯通性、综合性释论。以郭沫若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1页。

②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③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第6、8页。

④ 蔡和森、独秀《通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第10页。

⑤ 李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觉悟》,1922年1月1日,第2张第2页。

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4页。

⑦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自序”,第6页。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自觉运用经济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来考察中国社会,尤其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观点探究中国古史,形成以“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范式。^①在论战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各方学者展开激烈论辩。如此一来,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又被等同于历史规律本身。社会史论战各方依据的理论资源,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外,还有大量国际上阐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沙发洛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波卡洛夫的《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库斯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等。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和具体成果呈多元的局面,这也成为参战者各执一词、难成共识的主要缘由。在论战中,人们过分迷信理论的功用,执着于理论争辩,而忽略了对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导致此时唯物史观主导下中国史研究根基不够牢固。这一阶段唯物史观的运用中显露的最大弊端在于公式化和机械论倾向。

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吕振羽、翦伯赞等为克服唯物史观应用中的偏失,主张以辩证法引领唯物论。吕振羽申明“史的唯物辩证法,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史的唯物论,是唯一的历史学方法论。”^②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做了更集中的阐发。翦伯赞亦称唯物史观为“史的唯物论”,“所谓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产过程中,去理解的——从辩证法看来,上述的现象,正是辩证的方法,辩证的论据’。所以关于整个宇宙及其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说明,就一定要应用辩证的唯物论”。^③书中全面阐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下层基础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理论与实践之辩证的统一”等问题。这些观点成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翦伯赞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之外,重点放在对“经济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清算上,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与“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统合起来解说历史的发展,从而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新境界。由此,辩证法成为唯物史观成立的根基,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

三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解释,“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党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成为对唯物史观的“官方界定”。书中推导出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在中国更是影响深巨。是否信守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成为是否遵循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如何将五种生产方式套用于中国历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心论题。

与此同时,在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出现了“历史唯物论的中国

① 参见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56页。

②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7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版,第14页。

化”的呼声“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响应,致力于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其中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最具开拓性。1941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成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②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不是凌驾于中国历史之上,而是渗透到中国历史之中;不是披在中国历史身上的一件外衣,而是与中国历史骨肉相连。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术中国化”运动构成中国人传播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颇具光彩的一环。

后来,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最终将唯物史观推向阶级斗争学说。精于辩证法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③这样,阶级观点与唯物史观被赋予同一性,唯物史观被归结为阶级观点,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野所在。领袖的权威论断主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历史遂被书写为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文学、哲学研究也处在阶级斗争观点的笼罩之下。由此,唯物史观蜕变为阶级斗争史观,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持续达数十年之久。

近代以来,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其内涵从“历史的经济解释”到辩证法派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再到阶级斗争学说,这种演变既与思想资源从日本、欧美到苏联的转换相联系,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经过了一定的选择、过滤和加工,其中既有积极的创造发展,也有特殊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乃至背离。当下要坚守和传扬唯物史观,首先必须展开正本清源的研究,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厘清马克思主义演化的历史脉络,在准确把握唯物史观要义的基础上创制新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话语。

(责任编辑:潘晓霞)

①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第3版。

② 参见张越《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6页。